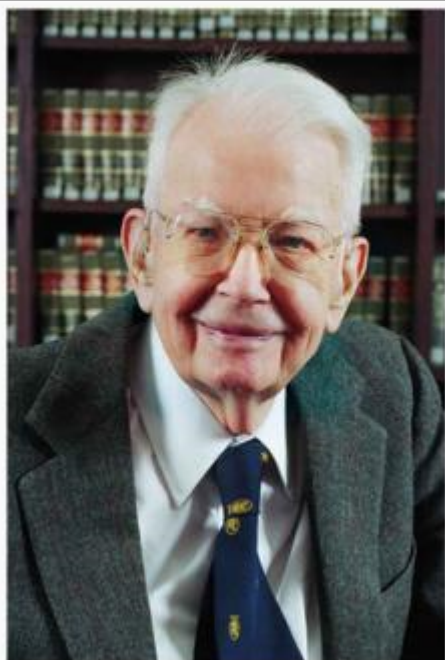


Ronald Coas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寇斯 (Ronald Harry Coase) 1910 年 12 月 29 日生於英國英格蘭倫敦，1932 年由倫敦經濟學院畢業，隨即展開教學生涯。1932~34 年，寇斯任教於丹迪經濟學院，而後轉至利物浦大學（1934~35 年），於 1935 年回到母校倫敦經濟學院當教席。寇斯在 1947 年就移民美國，1951~58 年在水牛城大學謀得教職，1958 年移到維吉尼亞大學，至 1964 年即轉赴芝加哥大學，擔任法律學院和商學院合聘教授，到 2013 年去世一直是芝大的名譽退休教授。寇斯在 1964~82 年這一段長時間，由達瑞克特 (Aaron Director, 1901~2004) 手中接下著名的《法律與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主編重任，奠定了該期刊迄今的崇高學術地位，也使法律經濟學發出炫人的光芒。2013/09/03 在芝加哥以高齡 102 歲辭世。

寇斯於 1960 年提出「社會成本問題」，建立交易成本理論以及寇斯定理的基礎。不論是在產權理論、法律經濟學等，都有著相當了不起的貢獻，也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鼻祖。

#### 「寇斯定理」

寇斯在 1960 年的「社會成本問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文中指出，明確界定的財產權，可以克服交易的外部或延展的成本 (externalities)，這就是他的「寇斯定理」。例如水污染事件，如果居民擁有水的財產權，則廠商必須付費給居民才能排放廢水；相對地，如果擁有水的財產權是廠商，那麼居民必須付費給廠商，請廠商減少排放廢水，是故寇斯認為只要財產權的歸屬是明確的，不論財產權的歸屬在哪一方，透過市場自由交易協商行為，外部性的問題就能獲得解決，達到經濟上的效率。

譬如，火車經過農田，燒煤濺出的火星會引燃週圍農田裡的莊稼，對農民的利益造成損害。

在這個例子中，核心問題就是先界定產權，判斷火車有正當權利通過還是農民有權利不讓火車通過，兩種產權結構會導致完全不同的分配結果。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制定契約法；也可以由政府來界定火車通行的市場，使得農民可以“出售”火車通行的權利；或是由政府規定對火車通行收取庇古稅來對受害者加以補貼。這幾種制度都可能達到同樣的產權結構，從而導向最優的分配結果。

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勒(G. J. Stigler, 1911~1991)更就寇斯的主張創出了膾炙人口的「寇斯定理」這個專詞，但史蒂格勒的詮釋：「若交易成本為零，就不需政府作任何干預，不論權利給誰，透過交易能主動到達到經濟效率。」。

寇斯定理的前提是在議價成本（或稱為協商成本、交易成本）小的情況下才能成立，所以當外部性事件牽涉到的人數不多時，政府只要將財產權明確地歸屬給一方，市場就能經由協商方式達到效率，但若牽涉到的雙方人數很多時，議價成本高，則無法協商成功，寇斯定理無法實現。另一前提是，造成外部性的來源也必須能清楚地界定。

雖然寇斯定理建立在交易費用為零的基礎上，但在現實中，交易費用永遠存在。為了簡化問題，減少爭議，經濟學家主張轉向寇斯定理中的一個關鍵字：“談判”，或譯為“討價還價”，即交易雙方協調溝通的整個過程。在設定其他約束條件的情況下，“談判”所引致的費用就是交易費用，也可以認作是對談判過程的懲罰。這樣一來，經濟學家就可以使用相對成熟的涉及“談判”的博弈論來研究寇斯定理。

談判結果顯然與雙方的初始地位，談判的持續時間，談判所採取的流程，雙方談判的能力等因素有關，博弈論學者對這些問題已有較為成熟的研究。但傳統博弈論的缺陷在於它對於個人理性有極高的要求，在現實世界中同樣無法滿足。所以越來越多的博弈論學者開始用實驗經濟學的方法來檢驗寇斯定理。實驗室實驗的優勢在於，它既可以保證一個嚴格的博弈框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模擬真實環境，推測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談判結果。

再進一步分析，一些次要的因素也可能極大地影響談判結果。譬如，談判雙方是面對面直接談判，還是透過其他仲介，結果就可能很不同。譬如，談判雙方是否清楚地了解對方在交易中獲得的收益，這可能也是影響談判結果的重要因素。還有一點，雙方獲得產權的方式，對於產權合法性的認同，可能也會影響談判結果。譬如有些人在談判中，雖然已經明確知曉產權配置，但仍然在談判中堅持“公平”的方案，不顧現有的產權配置。這並不是非理性，而是人們出於文化、社會背景對於產權抱有不同的認識罷了。

所以，我們從中至少可以得到兩個結論。第一，在缺乏時間約束且資料較為充分的情況下，交易雙方更有可能達成一致。因為在這種情形下，人的理性和談判能力能夠較為充分地得以施展，從而推動了交易的有效性。第二，博弈論談判框架以外的那些社會性因素，如談判雙方是否直接面對，雙方的產權獲得方式等等，都會顯著影響到談判的效率。這些社會性因素

是未來學術研究的重點所在。

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法學院院長 Farnsworth 曾有個重大發現。他訪談了 20 個如：空汙、養狗的噪音、照明設備太亮…等擾鄰案件(因為外部性而起)的律師，發現訴訟過程導致的「敵意」或情緒，使得這些案件，即使在訴訟後也沒有後續談判，沒有交易，更沒有解決。這個發現嚴重地挑戰寇斯定理。當然，Farnsworth 所訪問的案子是上訴案件，樣本有先天的偏頗。因為通常能事先交易調解的早做了，會到上訴法院的，大都是不願交易的。再者，案件量少且訪問的是律師，有些案主並不會告知律師，後續的處理情況。

那麼法院判決後，到底「交易」能不能真的發生，讓爭議的資源做最有效的運用呢？中研院法律所張永健研究員與林常青，做了有系統的研究。他們利用 2011 到 2013 年間 3 百多個無權占有他人土地興建地上物的民事案件，輔以地政事務所的地籍資料來做研究。依我國法律，土地占有人(興建建物的人)沒有租賃、借用或其他權利，地主必勝，能要求占有人拆屋還地。比較值得討論的情況是，如果建物價值高於地主的土地價值，拆除不符合經濟效率，會有訴訟後交易的誘因。

他們做出的實證與 Farnsworth 不同，資料顯示有 6% 的案件，地主後來將土地賣給占有者。進一步的分析更發現，若(1)建物與土地的市場相對價值較高、(2)交易雙方人數越少(以上兩點符合寇斯理論的預測)、(3)被告若聘請律師(這或許和律師較能於法庭上冷靜地就法論理，免於兩造訴求情感發洩而造成敵意有關)，則越容易發生訴訟後土地所有權的轉移。再利用 Google 街景進行調查，發現這些案件只有 13% 非法占有土地的建築物是被拆除，相反地，卻有 43 % 是被保留下來的。由於資料的侷限，無法再進一步分析這 43% 是否都進行了訴訟後交易。台灣的實證似乎看出，寇斯定律還是可以用來有效解決爭端。

根據寇斯定理 (Coase Theorem)，陽光、空氣等財產權定義不明的共有資源 (common resources)，能夠藉由產權界定以及自由交易，達到限制企業生產過程製造的環境污染、濫用共有資源等外部成本問題。想想例子：碳交易機制、台北市使用專用垃圾袋。

林常青，《經濟五四三》小孩吵架怎麼辦？有請寇斯大師，天下，2017-06-12。

吳惠林，念寇斯 思「黑板經濟學」，大紀元，2019-03-16

樑捷，寇斯之後的寇斯定理，2013。